

浙江温岭：驻村干部和村干部考核管理同标准，形成合力精准发力持续用力

“三同”考核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

眼下，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打角村正在进行自来水水表改造，原先的每户门前一水表，将以排为单位集中放置。

按说，这不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村里的“铁三角”一直不敢掉以轻心，做到户户都落实到位。

“铁三角”指的是镇(街道)驻村干部、村支书和村委员会主任。过去一年多，在“铁三角”共同努力下，打角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了2500多米长的河道亮化，建成了1800多米的健身步道，完成了文化礼堂建设，对村里的广告牌进行了统一规范……

乡村振兴，组织先振兴。去年以来，温岭市以“三同”考核为抓手，让驻村干部和村主职干部“承诺同作、工作同抓、责任同担”，形成合力、精准发力、持续用力，大力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两张清单明职责，干事有目标

去年4月，打角村经过了换届选举，产生了新班子。差不多这个时候，温岭市开始实施“三同”考核。考核要求以村为单位，结合市、镇重点工作和本村发展，围绕党建和重点工作制定两张清单。驻村干部和村主职干部要就主要内容，在镇村两级干部大会上公开承诺、认领并接受群众监督。

这两张清单，立即让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们进入了“状态”。驻村干部林玉娟说：“制定这两张清单，需要对村庄有深入的了解，设定的目标要符合村里的实际，针对难题有的放矢。”林玉娟和村干部们一起，挨家挨户征求意见，收集村民关于村庄发展的意见，经过党员、村民代表多次商定，最终将两张清单列了出来。

清单中，不仅有安全生产、“五水共治”等共性的内容，也有打角村个性的内容，如中央通道泽国段的征地拆迁工作。

目标明确后，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们就有了工作的压力和动力。“我们每天安排人员值班，对项目进行监工，每个月还要向镇里汇报项目

进展。”村支书狄海燕说。

农村工作不好做。中央通道泽国段的征地拆迁工作，涉及打角村18户村民，由于安置、补偿等协商不下，村民们一直持消极态度。这块硬骨头，就需要“铁三角”去啃下。新当选的村委员会主任颜妙富记得，那段时间他每天起早贪黑，“我们挨家挨户去讲政策做工作，每户至少去七八次，最终18户人家都签下了协议，比要求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月。”

上一届，狄海燕也是村支书，对比之下，他深感“三同”考核给基层队伍带来的变化。“就像一潭水被激活了。”他说，“三同”考核实施之前，因缺乏村里的发展目标和村干部的干事清单，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不是很强，有时开会，很多村干部也不到场；“三同”考核实施后，大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干劲，忙碌已成了习惯，如今，大家坐在一起开会到后半夜的场景，也很常见。

温岭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永红说，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两支队伍是乡镇党委推进工作最为倚重的力量，“三同”考核管理机制的建立完善，通过任务分解、进度公示、考核评估，将当前乡镇繁重的工作任务压实到一个个基层“作战单元”，在工作严抓中实现了干部严管，乡镇党委的调控力显著增强。

温岭全市16个镇(街道)829个村共制定并公示清单1658份，承诺年度党建工作事项9351项，重点工作事项12560项。到去年底，各地完成清单项目16729个，完成率达91%。

“红黑榜”上论英雄，干事有动力

泽国镇政府大堂里，摆着89个行政村“三同”干事“互看互学互比”大擂台。每季度，镇里对这些村的基层党建、重点项目推进、环境整治等各方面中心工作推进考核打分，考核结果用红、黄、黑三种颜色标准，在擂台上进行公示，并将评比结果作为附加评分项纳入“三同”年度大考核。

陈享福于去年初次当选大池陈村村支

书。当时，由于之前烧窑产瓦片，村庄环境脏乱差，违建也多，第二季度，即因环境整治不力上了“黑榜”。

这让驻村干部和村干部脸上非常挂不住，主抓“三改一拆”工作的村委员会主任陈志萍率先带头拆了自家的违建厂房，“铁三角”几乎出现在每个拆违现场……

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大池陈村共拆除5.7万平方米，清运垃圾4000多吨，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去年第三季度，大池陈村顺利跻身“红榜”。之后，大池陈一直荣登“红榜”。这就是“红黑榜”带来的积极效应。“王永红说，“三同”考核通过设置“红黑榜”让村庄“打擂台”，乡镇根据实际对各村党建和中心工作推进考核，每季度或每季度发布榜单，让做得不好的镇村干部及时红脸出汗。

年终，温岭市对镇村干部实施村级、镇级两轮考评，综合两轮考评得分，确定绩效排名。去年以来，温岭市共评出“红榜”村164个、“黑榜”村71个。

年度“红黑榜”情况与镇(街道)联系领导、驻村干部的考核挂钩，也作为村干部评优评先、绩效薪酬的重要依据。年度“红榜”村的主职干部，其当年绩效报酬可上浮30%，而年度“黑榜”村的，一般列为下一年度的后进村进行整改。2017年，村主职干部“三同”考核优秀与后进的绩效报酬相差达到2万多元。优秀村集体奖励金额多达30万元。

有奖就有罚，对考核靠后的52名驻村干部和91名村主职干部予以组织处理，其中21名村支书被免职。

就这样，慢慢干的干部“坐不住”了，习惯“向上伸手”的干部等不及了。“三同”考核抓常抓细，让村主职干部和驻村干部都有了紧迫感。一批有激情、能干事的优秀驻村干部、“和合好班子”“村级好搭档”脱颖而出。

坚持不懈抓“三同”，推动乡村振兴

一年来，温岭市81.3%的村党组织堡垒

新华社南宁7月19日电(记者王念、向志强)年过半百的苗族村民韦院金没想到，有一天能够带着房子一起搬出深山，住了几十年的木楼成为旅游景点的组成部分，自己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记者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水镇新新村看到，村民正在复原重建从苗族山寨拆解后运来的吊脚楼，十几栋木楼已立起来，长廊、牌坊、广场和舞台等也在建设中。在一片片稻田和延绵的树林间，新建的梦呜苗寨逐渐成形，旁边就是双龙沟4A级景区，古色古香的苗族干栏建筑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一幅田园风景画。

韦院金家的吊脚楼就在稻田边上，已经建好入住。韦院金在复原重建老房子的工地上忙着他，他的母亲在家带孙子。老人说：“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但这里交通方便，各方面条件都好多了。”

韦院金家人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他们的生活也成了景区的一部分。游客在双龙沟游过了山水，往往会来到梦呜苗寨，在村民家里打油茶、吃农家饭，体验一下原生态的乡村生活，村民们也有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韦院金的老家在黔桂交界处，是距离县城147公里的一个偏远苗族山寨。今年春节后，韦院金和同村10多户村民一起，连人带房搬到了县城旁边的新新村，这些苗家吊脚楼先被拆解成木头木板运出来，在新村重新安装复原。

韦院金告诉记者，老家交通不便，人多地少，村民基本靠外出务工为生，比较贫困。搬迁到这里之后，他和弟弟、弟媳在景区工作，每个月收入两三千元，也有田地可以耕种。每逢节日，他们穿上民族服装为游客表演民族歌舞，“白天上班，晚上演出，收入比过去翻了几番。”

通过打造民族风情旅游项目，易地搬迁的群众依靠旅游扶贫走上了致富路，当地旅游形态也得到丰富。双龙沟景区还通过林地承包、土地入股等方式与当地村集体和村民合作，利用原始森林和水域等资源，开发了游览观光、休闲娱乐、康养文化等多种旅游服务。景区负责人吴日红告诉记者，景区去年3月正式运营至今，游客接待量突破60万人次，同时接纳了140多人就业。

地处桂北的融水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滇黔桂石漠化片区县。当地旅游资源丰富，拥有民族风情、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等多种旅游形态。

融水县副县长管丽文介绍，按照“一个龙头景区带动一片生态旅游、带富一方百姓”的发展思路，全县实施旅游与乡村振兴、易地扶贫搬迁、精准扶贫相结合的“三结合”工程，以及景区+贫困村、能人+贫困户、公司+农户、互联网(协会)+农户、旅游+金融扶持的“五相加”模式，旅游产业与脱贫攻坚协同推进。

目前，融水县共打造了4个4A级景区和5个3A级景区，推出苗族风情游、芦笙斗马节等活动，整合资金打造旅游扶贫示范点，走“以旅扶贫”“以旅富民”新路子。旅游业已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4300多人脱贫。

生态移民搬迁工程 绿了草场富了牧民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李仁虎、王雨萧、张丽娜)天色蒙蒙亮，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温都尔吉管护站里，42岁的站长哈斯巴特尔揣上几块奶豆腐出门，开始了一天的草原巡逻。5年前，哈斯巴特尔还是扎鲁特旗阿日昆都楞镇那仁宝力皋嘎查的牧民，在家里2600亩草场上放牧着200多头(只)牛羊。那时的他没有想到，受损的草原会再次焕发出绿色的生机，搬迁后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

哈斯巴特尔告诉记者，过去一度无节制地放牧使草场严重退化，后来村子周边又陆续建起铝厂，最近的铝厂离草场仅1公里左右。过度放牧和工业排放导致这里的草枯黄矮小，牛羊等牲畜经常患病。“我小的时候草能长到腰这里，可那几年，连脚脖子都没没过。”哈斯巴特尔对记者说，草原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牧民们的收入也一天比一天薄。

阿日昆都楞镇与特金罕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连，霍林河、阿日昆都楞河等多条河流流经此地，过去草原植被减少导致土壤蓄水能力降低，好几条河都发生了断流。2013年春天，阿日昆都楞镇正式启动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在政府帮助下，9个自然村共451户牧民迁往150公里外的鲁北镇，免费住进了新楼房。2016年，又有2个自然村的338户牧民迁出。两次生态移民腾出的82万亩草场实行全年禁牧，每年立秋后设立一个月打草期，供牧民打草作为牲畜饲料。

牧民们陆续迁出，草原生态逐年恢复。去年，周边几家铝厂先后建设了超低排放净化系统，氟化物、二氧化硫和颗粒物等浓度均大幅降低。82万亩平地和小丘披上了厚厚的“绿毯”，几千千涸的河流又重新流淌起来。

哈斯巴特尔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00平方米的新家里，热水器、抽水马桶、各式家电一应俱全。他给记者算了过去一年全家的收入：管护站工资3.6万元，养牛收入5万元，草场承包费4.5万元，草场补贴2.5万元，耕地承包费3000元，家里其余4口人每月享受550元生活补贴，加起来月收入近20万元。“住上了新楼房，日子也越过越舒心了！”去年8月，哈斯巴特尔还给家里添了一台崭新的越野车。

阿日昆都楞镇党委书记额尔敦布和介绍，旗财政共投入资金近1.7亿元，作为阿日昆都楞地区生态移民住房安置政策安置费，先后在鲁北镇和霍林郭勒市集中安置789户牧民，并提供管护员、环卫工人、幼儿教师、协警等公益性岗位，解决牧民就业问题。对于搬迁户中未获得就业安置的人员，每人每月提供550元生活补贴。

几天前，哈斯巴特尔回到从前居住的地方，如今那里满目苍苍，绿草如茵，远处河水缓缓流淌，蓝天白云下，五颜六色的花儿竞相开放。哈斯巴特尔说，草原又变回了记忆中他的样子。

寨子随人一起搬 青山绿水富村民



驻村干部是贴心人

日前，在南密村，吕远成(右一)闲暇时与村民交流。

仲夏时节，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黄茂营乡南密村的田间地头，身形清瘦、皮肤黝黑的驻村干部吕远成正忙着四处奔走。58岁的吕远成，是一名拥有34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曾是察哈尔右翼前旗民政局副局长，2015年主动要求驻村扶贫，当年9月来到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黄茂营乡南密村。他环村巡查，梁上坡下全是旱地，没有一亩水浇地，撂荒一片，看着心酸。于是吕远成带着村干部，联系水利局、发改委、财政局等部门，争取到专项资金给村里打了17眼水井。4000多亩的旱地从此变成旱涝保收的水浇地。

出村的土路坑坑洼洼，制约了脱贫，吕远成积极向上申请，修起4.2公里的水泥路，与旗高路连通。如今，新建设的移民新村已进入全面收尾阶段，吕远成把近期的工作重心调整在这方面，希望更多村民能早日住上新房。在奔波忙碌一件件大大小小的脱贫事务中，他越来越摸到了门道，与村民的心也贴得越来越近。

短短近3年时间里，南密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铺设的水泥路把封闭的小山村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绿油油的田地让农民看到了丰收与希望，移民新村中崭新的砖瓦房也总能听到欢歌和笑语。

新华社记者彭源撰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牛鼻子”

本报记者 姜立华

大海航行靠舵手，乡村振兴靠组织。人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乡村振兴也是如此，组织强则乡村强，组织弱，则乡村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必须着力推进组织振兴，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堡垒。

但现实来看，当前农村组织建设面临人才紧缺问题。近年来，农村人口大量往城市集中，年轻人到城市就业，能人不愿意回农村，村级组织建设面临重大压力。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相当部分农村的党员干部，选上了之后常年不在村里，忙着到城里或者外地打工，尤其是在一些空心村，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党员老龄化严重，根本无法组织群众开展乡村振兴。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一些村庄，即使给了资金，也不知道怎么花？政府前期帮助搞好了，后期维持和维护，都是一个大问题。

那么如何加强组织振兴？首先，对于党员人才不缺的地区，应该加强政治建设，强化思想教育，抓住“关键少数”，紧盯基层支部，精心策划，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不断强化“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使得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引领者、组织者和实践者。

其次，对于基层党员人才欠缺的乡村，需要拓展思路，多方位吸引人才。

记者在一些地区调研时发现，充分吸引“乡贤”党员回村推动乡村振兴是不错的办法。

“乡贤”党员在外，往往功成名就，经济基础好，领导和组织能力强，尤其是一些经商人员或者企业家，有管理公司的能力，又有发家致富的经营能力，在本村村民中有较高的威望，回到乡村后，能够迅速进入角

色，起到良好的效果。

再次，对于几乎没有人才的乡村，需要派驻“第一书记”，下派各种强有力的“驻村干部”，或者吸引各类“党员志愿者”，前往农村进行指导和服务，帮助实现乡村振兴。

解决人才短缺之后，还要及时跟踪考核，实现基层组织的“优胜劣汰”，着力解决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问题。

当前我们农村干部是村民自治选举出来的，尤其村委会，按照村民自治法，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干部要免除程序繁琐、流程长，那么那些心思不在乡村振兴上的人，如何加以鞭策和制约？

为此，一些地方从实际出发，出台了不称职村社干部“停职教育”暂行办法，对政治不过硬、岗位不胜任、长期不在岗、工作不作为、办事不规矩、群众不满意的村社干部，按照规定程序停职教育，实行再教育、再锻炼、再使用。这样既对村社干部有

制约，又避免了和村民自治法冲突。

最近，浙江绍兴187名村社干部因不作为被停职，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些被处理的村社干部工作上虽没有犯大的错误，但大多在干事创业上不作为，无所事事，得过且过；也有的忙于自己的私事，或长年外出，对村里的事不闻不问；有的则是因为在群众评议中收到了“差评”而受到处理。

村干部，不作为就下课。这些年在浙江，以及江苏、湖北、宁夏等地，都有村社干部因此受到停职等处理。这些措施，极大地促使村社干部积极作为，担负起乡村振兴的使命。

此外，还应注意“村级小微权力”的运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量资金往农村投入，一些村干部容易犯“红眼病”，甚至对一些扶贫资金也“雁过拔毛”，因此，必须在制度上、执行上、监督上花大力气。